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DONG FANG CHI ZI · DA JIA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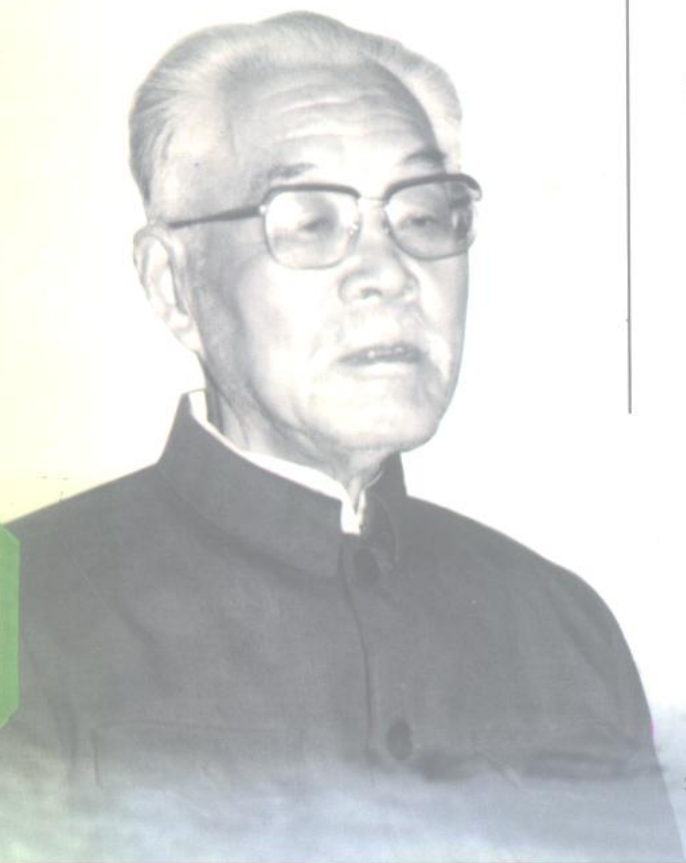


张岱年 卷

老年回忆
谭理

如何分析人性学说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疑古与信古



华文出版社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张岱年 著

张岱年卷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王彬,雪步主编.

-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1

ISBN 7-5075-0667-3

I. 东…

II. ①王… ②雪…

III. 张岱年-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00 号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张岱年卷

著 者:张岱年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雪波

封面设计:文彬

经 销:新华书店

社 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63099271 63097990

邮 编:100800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科普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1/32

字 数:247 千字

印 张:12.375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册

书 号:ISBN 7-5075-0667-3/Z·105

定 价:22.00 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 1 **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
- 3 老年回忆
- 97 **第二部分 学术作品**
- 99 论“外界”的实在
- 108 谭理
- 121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 136 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 155 如何分析人性学说
- 187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
- 206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 219 论价值的层次
- 232 论价值与价值观

- 246 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 251 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
- 260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
及其演变
- 271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 290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 298 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 319 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
- 328 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
——平生思想述要
- 337 **第三部分 随笔短论**
- 339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 343 义理、考据、辞章
- 346 “百家争鸣”与“定于一尊”
- 350 “愚民”与“明民”
- 353 说杨墨
- 356 读经与读子
- 360 评“内圣外王”
- 363 谈士节
- 366 漫谈正名
- 370 评“三不足”
- 373 辨“程门立雪”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张岱年卷

- 376 疑古与信古
379 庄惠濠梁之辩
382 礼义与人心
384 饮食之道
——关于“美食”与“疏食”的感想
387 修辞立其诚

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



耄年回忆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期

我生于1909年5月23日(夏历四月初五日),当时父母住在北京。据一个同族的长辈对我说,当时你们家住在北京西城酒醋局。到三岁时,母亲带着子女回乡居住,我幼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原籍河北省献县,我家所在的村庄名叫小垛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到50年代,这个村庄划归沧县,我的籍贯改为沧县了。

我父亲名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母亲赵太夫人,生于1869年(同治八年)。我们家历代在农村生活,到我祖父时渐致饶裕,成为中小地主。

祖父有子七人，我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的开始。众清公于1905年（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1907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以后，1918年（民国七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曾任沙河县知事及枣强县知事。晚年在京闲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晚年喜“黄老之学”，此为黄帝老子高于儒家，研究《黄帝内经》与《黄庭经》。喜书法，崇尚颜体，所写的字刚劲凝重，尝印一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又认为在五伦之外尚有一伦，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称之为“人”伦。因而自号六伦。晚年在京经常来往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纶（云诤）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

母亲是河北省交河县赵家庄人，勤俭持家待人慈和宽厚。民国初年即回乡居住，主持家务。母亲生四子二女，劬劳实甚。我们长兄名崧年，字申甫，一字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还有一个四弟。约在1918年（民国七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中柴堆失火，我家场院距离很近，母亲指挥长工赶快搬移我家的柴堆，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惶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我们四弟很伶俐、胆大活泼，一天独自到村边一个池塘洗澡，竟至溺死，没有抢救过来。当时吾母卧病在床，遭此惨疼，遂于次年（1920年）4月5日逝世，寿仅52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请过几次中医，都不见效。当时我年幼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三岁时随母回乡，过田园生活，五六岁时进村中族人

办的学塾，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一个表兄卢子义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只是背诵，并不讲解，也教我们看新式小学课本。当时念的书不多。有一次到村中学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听来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但没有继续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大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都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九年）夏初，办完母亲丧事，父亲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北京居住。当时父亲任众议院议员，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买房子，仅租房居住。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属于中下等类，每月租钱银元30元。到这年秋天，由大兄申府安排，叫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二兄上高小三年级，我上高小一年级。初入学时赶不上，家里又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很快就赶上了。三年之后，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四。当时北师附小的主任是张铎民（安国）先生，毕业后还有联系，但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北师附小在解放后改称宏庙小学）。

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几年后才回国。

我和二兄崇年经常在一起。母亲在世时，常对二兄和我说：“你们要努力向上，作个好人。”我们遵遁母亲的遗教，

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父亲不过问我们的学业,偶尔加以勉励。在所住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一幅对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这寓有勉励之意。父亲在住宅大门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自己过隐居生活的态度。

在京求学

1923年(民国十二年)暑期,我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试验班,入学即上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1926年初中毕业;1927年春考入高中班。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实即校长)林励儒先生为全校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林先生强调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听了非常感动,非常钦佩,从此“要把每个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一道德律令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之中。

当时国难深重,每年5月7日定为国耻节,举行纪念活动。当时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知道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是外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二是改造社会,革新政制。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卢玉温(光润)先生让每个学

生写终生志愿，我写道：“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今日看来很可笑，表现了当时狂放和幼稚。中年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了，但是报国之志是始终不渝的。

初中二年级之时，同学庄镇基喜读老庄哲学，于是引起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我初读《老子》，如入五里雾中，感到莫明其妙。后来读了一本《新解老》，其中认为老子所谓道即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原理，于是忽有所悟，对于老子学说有所理解。又读了《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

当时对于哲学有所了解之后，于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二小时，养成沉思的习惯。

高中一年级时，班主任汪伯烈（震）先生开了“中国哲学史”课程，我很感兴趣。汪师兼通文学、哲学、心理学，对于美国詹姆士哲学有较多的研究，常和我们谈论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汪师在一份题为《认识周报》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文章，评述了胡适、梁漱溟、朱谦之、张崧年等的思想，说张崧年是中国新实在论的代表。这时我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当时我在“作文”课中写了一篇题为《评韩》的文章，内容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专重刑赏的观点。汪师甚为欣赏，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也不过如此。”对于汪师的赞赏，我衷心感激。汪师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师大附中》月刊上，现在已遗失不

存了。

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教师和学生接触较多，因而印象较深。国文老师，汪伯烈先生之外，还有张少元（鸿来）、张建侯、董鲁安、卢伯玮、夏宇众诸先生。其中汪伯烈先生、卢伯玮先生对于我都很器重。也有一位数学老师丁文渊先生，师生情谊较深。我读初中时数学课成绩较好，丁师再三劝我研究数学，可惜我的兴趣后来转向哲学史方面了。

在高中读书时，我写了一篇考证列子的文章，题为《关于列子》，内容是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驳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投寄《北京晨报》于1928年3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稿费银元8元，当时甚为欣喜。

1928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当时本拟报考北京大学，那年北大招生较晚，因已被师大录取，就到师大入学了。原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阮庆荪、庄镇基、陈伯欧、陶雄、谷万川等也都考入师大，老同学又聚在一起了。由谷万川介绍，认识了王重民；由王重民介绍认识了孙楷第、刘汝霖。当时王重民、孙楷第等组织了一个努力学社，出版了一期《努力学报》，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题为《古书疑义举例再补》，是一篇考证文章。

当时阮庆荪、陈伯欧、谷万川等又组织了一个“人间社”，是一个研究文学的学社，在此社中认识了潘炳皋。人

间社有时请学者来校讲演，有一次请大兄申府来讲了一次，题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颇受同学们欢迎。申府后来在师大开“现代哲学”课程，讲新实在论哲学，历史系的张恒寿也来听讲，于是彼此结识，成为莫逆之交。

教育系的同班同学傅继良建议合译一本书，于是选择了杜威的一本小册《教育科学的源泉》，由同学高元白协助出版。傅继良还想再合译别的书，但我的兴趣转向中国哲学史，不想译书了。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采用学分制，不计年龄，学分够了可以毕业。许多学生由于生计困难往往中途到一些中小学任教代课，然后再回到师大受学，学分够了才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深喜自学，读西方哲学名著，不爱听课，因而过了四年而学分不足，又补了一年学分，于是1933年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导师是邱椿先生。由傅继良协助，此文在《师大学报》上发表了。

30年代至40年代的探索

1931至1933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也阅读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如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很

感兴趣,但不满足。1931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辨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

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最喜读罗素(B. Russell)、穆尔(G·E·Moore——译摩尔)、怀特海(A. N. Whitehead)、博若德(C. D. Broad)的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籍受到青年人的欢迎。我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畅,但能窥见大意。(40年代才读到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我衷心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以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尼采超人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我认为,辩证唯物论在认识论上解决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既承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又肯定理性的重要作用,理性认识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又高于感觉经验;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既肯定物质是本原的,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

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之始。当时写文，多署名张季同。（因为我敬佩“大同”理想，故署名季同。）

由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熊先生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的文章，对吾兄说：“我想和您弟弟谈谈。”于是我访问了熊先生。熊先生赠我他的著作《新唯识论》与《破破新唯识论》，我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不赞同他们“唯心唯识”观点，但钦佩他的独创精神。我访问金先生，金先生说：“你写的《问题》一篇分析得很好，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我访问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彼此见解相近。

1933年夏，在师范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秋季开学，让我讲授“哲学概论”。吾兄申府决定，让我用美国 D. S. Robinsou 的“An Introduction to living Philoosptuy”作为课本。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哲学，并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荫麟字素痴，对于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他赴美到斯丹福大学留学，1933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专任讲师（即副教授）。他虚怀若谷，看到我在《大公